



山縣志》後，再沒有寫在縣志上，但利用人脈的、鄉誼的傳播，四月八日的起舞，從香山舞動到澳門，雖然沒有正式官方的痕跡，但在人們的行為與血液上，真正表現出從香山到澳門的民俗相連，從社群的團結上看出民俗的倫理智慧和時間的動能，把地方、族群與精神力量連成一線。中山、醉龍與澳門的聯繫，確確實實出現在澳門自 20 世紀開始的不同記載中，而族群亦能夠連成一線地把團結的人倫倫理，體現在四月八日的時間倫理、農時倫理，以及對生活與經濟的祈願上。¹⁰²



五 澳門舞醉龍的發展

1. 澳門魚行與澳門舞醉龍

民間文化之傳遞發展往往與地區的經濟情況息息相關，澳門的舞醉龍亦如此。正如前述，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山人口遷移，經濟發展，澳門雖為明、清兩代與西方各國貿易交往的中轉站，但成熟的經濟制度在澳門的華人社圈尚未形成。鴉片戰爭以後，隨着各個時期人口的大量遷入，華人聚合形成一股強大力量，他們組織經商，且積極參與澳門的各種活動，影響力遍及政界和商界，這就是推動澳門文化發展的動力泉源。

自鴉片戰爭後，香港的開埠令原本已走下坡的澳門經濟更受重創，葡萄牙人藉當時清政府國力之衰退，借機擴張在澳門的勢力範圍，最終奪取整個澳門的控制權和統治權，澳門由是進入葡治時期。此後澳葡政府在經濟上曾實行多項措施，其中比較重要的為單方面宣告澳門為自由港，並推行自由經濟政策，¹⁰³ 鼓勵自由競爭。緊隨其後的是承充制之實施，讓某人或某團體通過競投方式，取得某一商業領域的壟斷控制，並附有嚴格的條文規定予以監管，投得者須定期向政府繳交定額款項，以換取該行業或服務的專營權和受到澳葡政府的保護。這種專營制度配合自由經濟體政策，直接改變了當時澳門的經濟結構，成為晚清經濟中一個特殊現象。另一方面，在香港開埠之初，澳門便失去原有的地位，大量外商轉移到香港發展，令澳門人口銳減、經濟嚴重受挫：“……葡國既無商船來往，澳門別無地利可圖，市面蕭條，人情渙散，其坐困

¹⁰² 第二章第一節至第四節作者：譚美玲。

¹⁰³ 當時的自由經濟政策實質上不論商人的出身或背景，他們可利用自身的資源，更可組織合攬營商，獲取利益。



情形，可立而待。”¹⁰⁴ 同一時期，鴉片戰爭後的中華大地接連遭受戰火摧殘，社會動盪不安，大量原本居住在內地的華人遷到澳門生活，當中有些是逃避戰火的平民百姓，但也不乏名紳貴胄。他們的到來不但為澳門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和財富，更重要的是補充了澳門流失至外地的人口，而且剛好與澳葡政府推行的“自由經濟”及承充制度相互契合，許多行業均由華商專營：“承充制度甫一開始，一些有經濟實力的華商就對此投入極大的熱情，並最終獲取博彩、鴉片、魚鹽、牛肉、豬肉、火水、火藥等商品專賣權……，絕大多數年度的專營權被華商競得。”¹⁰⁵ 華商通過這種專營制度獲得某行業的壟斷地位而獲取豐厚利潤，由此累積財富，為日後華人之結社及發展打下基礎。

踏入 20 世紀，華商一躍成為澳門的富裕階層。在以澳葡政府於鴉片戰爭後所實行的經濟政策為大前提下，澳門華商雖可通過壟斷澳門的各種行業而致富，但同時亦受到澳葡政府的諸多打壓和限制，因此他們必須凝聚團結起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和維持華商在澳門的地位，這是華商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特徵，因此各行各業均出現具有工商性質的社群，而社群凝聚的結果便是社團的成立。這就是把前述的各大小自由經濟體，以其行業、族群的團結、集社為依歸，而澳門魚行是當時唯一——至今天或者仍是唯一的，一個以行業為主體並具有族群核心的團體組織。¹⁰⁶ 除此之外，由澳門漁業的發展角度來看，其社團之成立還受到了當時澳葡政府的驅使：



即澳門漁業生意既不可歸一人承充，又不便任各人自由貿易，兩者均屬不宜，故澳門政府遵照葡國律例，設立澳門魚商行，歸其承辦，並規定澳門所有漁業商人均可入行。¹⁰⁷

從上面的報導可看出澳門魚行的成立是由於澳葡政府欲改變以往的承充制度，實行統一管理。據現時搜集到的資料顯示，澳門最早關於漁業的社團是聯群益魚業工會。¹⁰⁸ 在抗日戰爭時期，澳門魚行一直積極參與捐款活動，並於 1932 年 2 月 28 日舉行的會議中，除將募集的七千餘元匯滬之外，還公決三條辦法以集資金，直至戰爭停息為止。¹⁰⁹ 除了顯示魚行的愛國熱心，魚行內部是以設立公約的形式來進行籌款，證明當時的魚行已是一個有相當組織性的社團，並活躍於澳門商界。

後來於 1946 年成立的“魚業聯合會”¹¹⁰ 將魚行更作分類：

該會會址在營地大街九十四號二樓，另分三組，甲組（即原日鮮鹹魚欄行）辦事處在下環如意巷五號三樓，乙組（即原日鮮魚市販行）辦事處新馬路四十九號三樓，丙組（即原日鹹魚買手振興行）辦事處海邊新街一百七十一號二樓……¹¹¹

鑑於自由買賣章程不宜於澳門地區生意，亦無益於政府國課，

¹⁰⁴ 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十三，頁 18。轉引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編著：《澳門史新編（第一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 年），頁 224。

¹⁰⁵ 《澳門史新編（第一冊）》，頁 227。

¹⁰⁶ 澳門的中山同鄉會在 20 世紀 50 年代已經成立，主為中山的商人，來自不同大小縣市。另外，澳門 80 年代起有三鄉同鄉會、珠海同鄉會、隆都同鄉會等紛紛成立，這些都僅僅以鄉誼聯繫，並非如澳門魚行以行業，而又有大部分相同籍貫的結社性質。當然，當初並非全因中山的地緣，但當他們結社後，就發現這種地緣關係的情誼可以與職業掛鉤起來。

¹⁰⁷ 《澳門政府憲報》（1991 年 7 月 1 日第 1 號），轉引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頁 2193。

¹⁰⁸ 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351〈附錄〉的表格中。這裡要指出的是，聯群益魚業工會是在 1922 年澳門的罷工風潮中被列入澳葡政府暫定運作名單的社團之一，由此可見，在 20 世紀 20 年代或之前，澳門漁業已出現具有一定規模的社團。

¹⁰⁹ 陳樹榮：《籌賑兵災》（澳門：君亮堂出版社，2012 年），頁 23。

¹¹⁰ 《華僑報》（1946 年 5 月 9 日）。同樣根據《華僑報》於 1957 年 5 月 8 日的一份報導所得，當時有“鮮魚職工聯合會”十一週年會慶，這與魚業聯合會成立的時間吻合，因此相信“魚業聯合會”已在 1957 年或更早之前就更名為“鮮魚職工聯合會”。

¹¹¹ 《市民日報》（1946 年 5 月 9 日）。



從上面的記錄可知當時的魚業聯合會已包括魚欄和市販在內，雖然社團架構尚未成熟，涵蓋範圍和職能分佈仍未清晰明確，但已顯示出魚行內部集中人員的趨勢。與此同時，魚行內的一些福利性社團也相繼出現，如於 1956 年成立的澳門新橋市鮮魚福利會（即現在的紅街市鮮魚福利會）、1960 年的營地街市鮮魚福利會等，¹¹² 都標誌着澳門陸續有與魚業周邊有關的社區，亦即以街市為中心的工人社團出現。據澳門鮮魚行總會的記錄，1960 年澳門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的會員中，以籍貫中山的會員數量最多，加上今日的澳門鮮魚行總會副會長張國柱先生的口述印證，他家祖籍中山石岐，從祖父輩起已在營地街市賣魚，也見證營地街市（20 世紀澳門主要的最大的街市）的魚販主為中山人。

又以新橋市鮮魚福利會為例，當時只要在澳門新橋街市從業鮮魚的市販及職工，都能申請入會，而福利內容可體現在日常開支、重要時節的禮品、人員離世之慰問金，甚至平常的早餐、宵夜或晚飯等等，皆能說明在這段時期內，魚行內部已有更細化的社團組織出現，其職能也漸趨具體及有針對性，也體現了魚行內部的擴大與連結，具有團結該社區從業工人的意義。至 1963 年的浴佛節中，魚行醉龍醒獅大會就是由“本澳魚欄商，市販，職工業等聯合組成之籌委會籌備”。¹¹³ 這裡可以看出此時推動魚行舞醉龍的人員已包括街市內的職工（即為在街市中其他工作者），範圍更加廣大，他們聯合起來組成籌委會共同舉辦，令舞醉龍變成一種民俗活動（具有具體的儀式、活動及目標），此為魚行中的人員團結凝聚的最好證明。及後此會又更名為“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將批發和零售範疇的不同人士進一步集中起來。且看魚行在不同時期對於舞醉龍的活動的稱謂，也可看到發展、變遷的端倪。據《華僑報》上的記載，1966 年及以前都把四月初八日叫“醉龍醒獅大會”，1967 年至 1980 年多以魚行“團



圖 2-2 1960 年營地街市鮮魚福利會於閩澳公所成立
（由今營地街市鮮魚福利會會長張國柱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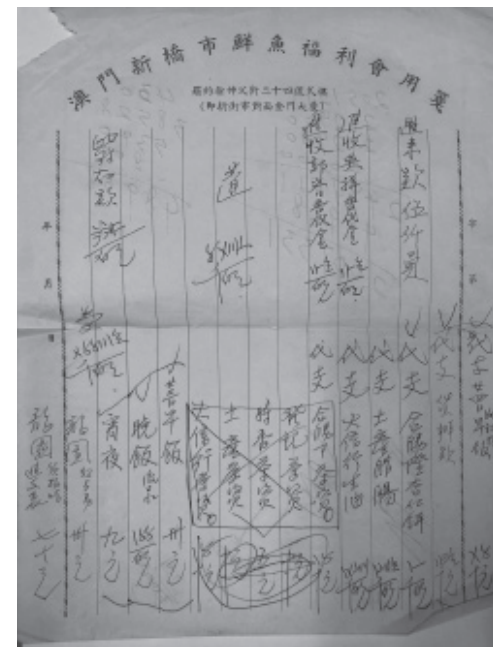


圖 2-3 新橋市鮮魚福利會的開支賬目

¹¹² 根據營地街市的張國柱先生口述，營地街市鮮魚福利會於 1960 年正式成立，會址就在當今三街會館旁邊的小屋，此地亦即昔日的“閩澳公所”之所在地。據 2017 年 12 月 2 日筆者團隊訪問張國柱先生於澳門營地街市鮮魚福利會。

¹¹³ 〈今日浴佛節 魚行舞醉龍 港九行友來澳參加敘餐〉，《華僑報》（1963 年 5 月 1 日）。



結日”來稱呼，1981年則開始用“醉龍醒獅大會”的稱謂，持續至今。

1991年，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與海產魚商總會合併，稱為鮮魚行總會。這次合併是集中澳門整個漁民行業力量的結果，這與時代之改變令漁業受到衝擊而逐漸衰落有關，卻也代表了在受到衝擊時，華人商會自然地凝聚起來共同面對的特質，同時鮮魚行總會的成立，致令澳門漁業財力和人力資源高度集中起來，是澳門醉龍民俗活動得以延續及產生成為醉龍節的關鍵因素。

2. 20世紀中葉以前的澳門舞醉龍

地域相連、中山人到澳門定居之盛，以及族群與澳門魚行團體的形成，已如前述，反映地緣、人緣與習俗信仰的活動，是聯繫起來的。而澳門舞醉龍的文字記載，以及關於澳門魚行的舞醉龍活動，可以找到的最早的資料記載，則出現在不同的口述資料中。根據澳門鮮魚行的劉惠洪師傅（1926—）所憶述：在他十多歲時，魚行已經有辦醉龍活動，而他在不足10歲時已在南京街市（河邊新街附近，已結業）看醉龍表演。¹¹⁴在戰前所舞的醉龍是三節的，包括龍頭、龍身、龍尾；魚行子弟更手持各式各樣的魚燈，於四月八日在全澳巡遊，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財源廣進。¹¹⁵另根據黃德鴻的回憶，他在小時候跟着家人參加舞醉龍行列去“旺街市”，記得30年代有龍船頭飯。¹¹⁶不過，這類



魚燈巡遊的習俗，據張國柱先生所說，已經於上世紀60年代開始失傳。¹¹⁷

據1940年5月15日（四月初九）的《華僑報》第5版，標題〈鮮魚行停止舉行轉龍大會〉的記載，因抗戰關係，澳門停止了舞醉龍的活動。這從側面說明舞醉龍在二次大戰前已成為澳門的民間習俗，而組織者就是鮮魚行。

戰後，1947年5月25日《華僑報》第3版上刊登了浴佛節醉龍巡行的消息：

抗戰多年未見，今年漁行舉辦。農曆四月初八日。乃浴佛節。在曩年例必舉行木龍巡遊會。各該舞龍人則飽餐醉飲後。□街舞弄。本澳該行向例年必一舉。惟抗戰期間。停止舉行已數年。聞今年照常舉行。並有鼓樂。魚燈。夜景。獅子等助慶。想屆時當有一番熱鬧也。¹¹⁸

抗戰後的澳門，面臨經濟困難，人口急劇下降的嚴重問題。據1950年的統計顯示，澳門人口曾因民眾移回原居地而減少23%，相信舞醉龍這類自發的民俗活動，無疑亦受到很大的衝擊，致使戰後的50年代又停辦了數年，到1959年才重新恢復。而根據澳門鮮魚行總會常務理事何智新先生在千禧年間接受《中華民俗大全》訪問時所說，這年重舞醉龍的意義重大，為了彰顯魚行團結，對抗外來惡霸，免其欺凌街市魚欄、魚販、魚工，所以在這一年開始搞團結同行的醉龍巡遊，以幾天的時間籌備，魚行內外同心協力，增強魚販同行的凝聚力，最後把舞醉龍辦好。這一年由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來辦舞醉龍活動，在澳門龍文化傳承和發展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它使舞醉龍成為澳門魚行

¹¹⁴ 黎東敏：〈醉龍遊鏡海 翩跹舞百年〉，載於《澳門雜誌》（2010年8月第76期），頁32。

¹¹⁵ 陳棟：〈四月八舞醉龍 展現圖騰色彩〉，載於《澳門雜誌》（1997年7月第1期），頁59。

¹¹⁶ 黃德鴻生年不詳，但據其《澳門掌故》書中的回憶，他在太平洋戰爭期間（1941-1945）尚是少年；書中他也談到浴佛節魚行舞醉龍：“筆者童時吃過不少龍船頭飯，也隨着家人參加舞醉龍的行列去‘旺街市’，這個有如出會景的行列是非常壯觀的……領頭而行都是魚行的頭面人物。飄色的飾演小童，亦大都是魚行的子弟，而各種各樣的燈飾，也是魚形的紮作。當然，最為威風是舞醉龍的勇士，他們頭纏神紅、簪花，在灌飲酒水之後，分別舞着龍頭、龍身和龍尾而起舞。”參看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頁58、282。此見黃先生生在40年代初是少年，他童年去旺街市時，該是30年代時候，其所說的跟劉惠洪所說的一致。

¹¹⁷ 參看澳門博物館：《澳門魚行醉龍節》（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2年），頁21。

¹¹⁸ 《華僑報》歷史資料庫（1947年5月25日）。



團結的象徵¹¹⁹。

正如前述，在上世紀 60 年代，舞醉龍是在“醉龍醒獅大會”的名義下進行的。這個可以說是魚行對於舞醉龍自覺舞動的延伸。舞醉龍成為具明確目的性、號召性的團結活動。

1966 年香港的《碩果社》詩刊第九集，刊了醉龍詩，作者鄭春霆（1906-1990，祖籍中山）在詩前有一篇〈醉龍歌〉序：

澳門四月八日鮮魚行有舞醉龍之會，蓋循古香山（今中山縣）農村舞木龍而曰轉龍頭之俗也。是日也，日將暮矣，盛筵陳席於營地街三街會館前，席地而坐，大碗酒，大塊肉，盡情痛飲，有觀其貪杯而強健者，益勸之飲，但使酩酊。然後以壯夫兩人左右挾持之，授以木龍高舉而舞。龍為堅木所製，長約三尺，分龍頭龍身龍尾三截，雕鏤龍鱗，漆以金珠，頻舞頻呼“生箇來”，彼其意寓祝魚蝦蟹之生動鮮活也。中有龍王飾鹿角，掛白鬚為群龍之首，必須年逾花甲者，始有資格舞之。於是導以鼓樂、魚燈、飄色等，遍遊全埠街市。途中有略醒者，又強之飲，若不肯飲，則含酒噴之，務令大醉為止。而醉人性必好勝，彼此不肯相讓，期所舞者生動過人，醉態百出，往往使人絕倒，而觀者亦群呼“生箇來”。斯時也，龍鼓大鳴，以助聲勢，舞益烈。轟動一時，蔚為奇觀，深宵始散。¹²⁰



在鄭春霆的筆下，除舉辦的時間——自傍晚至深宵、具魚燈飄色、舞的木龍

為三節和由別人噴酒於舞者身上等與今天不同外，60 年代舞龍過程的其他部分，與今天澳門舞醉龍的形態狀貌，已是基本一致的了。

1968 年鮮魚行業還是很興盛的。即使經過 1966 年的“一二三事件”後的澳門，鮮魚行中的不同街市的鮮魚福利會，如呬嗶街市（呬嗶街即今十月初五街）、內港的興利魚欄、寬利魚欄、通順欄等在 1968 年的國慶綵排比起其他行業都更大、更寬，而且有更多彩圖。¹²¹ 這足見當時鮮魚行在愛國意識以及財政力量上，都很豐厚，行業內也很團結。

但要說明的是，“魚行醉龍醒獅大會”之名在 60 年代曾有改變。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 1966 年的四月初八；1967 年 5 月 15 日《華僑報》第 4 版上就開始把那天叫做“魚行團結日”。報導是這樣表述的：“魚行團結日聯歡大會……在三街會館前舉行，並由鮮魚行友及家屬演出遊藝、武術等節目，計有：造型唱：為人民服務、革命造反歌、毛澤東思想照全球……武術計有：對拆及單人表演等多項……”可見，這是帶有愛國意識的醉龍舞動。

但是，從 1967 年的四月初八這一天往後至 1979 年的四月初八，在《華僑報》中顯示，除了武術、文藝活動，魚行行友還會去路環、中山、灣仔等地外遊，而他們在該日的活動，是用“魚行團結日”去作報導的，沒有明確地交代該年有沒有進行舞醉龍活動，（雖然報紙上沒有報導，但據筆者綜合訪問所得，行內有行友在文革之後，仍私下在這天舞醉龍，沒有中斷這個活動。）但他們並沒有忘記龍文化曾賦予他們的團結精神。澳門魚行沿用這種方式的報導直到 1981 年的四月初八為止，但到 1982 年就改變了。

3.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澳門舞醉龍的發展

從 1982 年的四月初七日（4 月 30 日）開始，《華僑報》又記以“醉龍醒獅大會”的稱號，且說明是澳門魚行的“傳統節目”；1983 年 5 月 19 日第 3 版

¹¹⁹《中華民俗大全（澳門卷）》編輯委員會：《中華民俗大全（澳門卷）》（澳門：《中華民俗大全·澳門卷》編輯委員會，2003 年），頁 634。

¹²⁰ 黃坤堯：〈香港碩果社詩人群的澳門描述〉，載於田豐、呂傑華、沈慧聲：《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第八屆粵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金會，2007 年），頁 84。據黃坤堯教授的資料蒐集，碩果社共有五首醉龍詩的記錄，而鄭春霆是畫家，對澳門當時較純樸的風俗，記錄得真切而富動態；而寫醉龍曲的吳肇鍾，是久居澳門的白鶴派武術的傳人，吳氏的曲寫舞醉龍的動作利落可觀。

¹²¹ 陳樹榮編著：《一九六八年澳門國慶風采》（澳門：君亮堂出版社，2012 年），頁 75-82。



的《華僑報》更開始稱之為“傳統節日”，有籌備會的成立，有比以前更詳細的人名表和分工細部。從報導中，我們完全可以感覺到魚行及屬下的民眾“不忘初心”，強調團結的重要性，利用舞醉龍的日子，讓大家放下手上的工作、平日買賣上的紛爭不悅，和諧團結，為醉龍、為祈福、為和諧辦好這個舞醉龍活動。¹²²

關於舞醉龍活動的隊伍，據 1959 年 5 月 14 日《華僑報》記載，有武術健身班成立參與，“教練是林（繼）昌”。隨後的年份除了舞醉龍，還有不同的拳棍表演記載在當天的活動項目中，也有大頭佛（佛公佛婆）的表演。1973 年開始有記載舞醉龍由謝傑雄、何華添負責籌備醒獅、武術、文藝演出，但 1974 年至 1979 年大多都只言是魚行團結日休息。

1991 年澳門鮮魚行總會成立，把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與海產魚商總會合併，目的在於把分散各街市的商販職工聯合起來，讓與澳門的賣魚業相關的不同層面人士集中為業界做事，擴大團結融合的力量。澳門鮮魚行總會在每年四月八日所舉行的活動，就繼續沿用“醉龍醒獅大會”之名至澳門回歸。

澳門的舞醉龍活動自上世紀 60 年代起至今，還有一項與市民共甘苦、祐平安的活動——派發“龍船頭飯”，也叫“龍船頭長壽飯”。從上述鄭春霖的詩序可知，鮮魚行眾人會在三街會館前的盛筵陳席，體現其與澳門其他民眾分甘同味，有福同享的精神，後來終漸變成派龍船頭飯的習俗。澳門居民多流傳說：吃過了龍船頭飯的孩子“精乖伶俐快高長大”，¹²³大人好身好運。¹²⁴如今派龍船頭飯已成為深受市民歡迎的民間習俗，每到四月初八這天，領取龍船頭飯



的人群，一早已擠得派發地點水洩不通。據 1995 年《華僑報》5 月 8 日第 1 版所記，營地街市所派發的龍船頭飯多達二萬餘盒。

澳門最早只有營地街市派龍船頭飯，一直至今，只是曾有兩段時間因為街市重建而停止了一兩年。¹²⁵至 1985 年紅街市也開始派龍船頭飯。1988 年紅街市更開始自行煮飯來派發。¹²⁶1999 年後，水上街市也有派飯（近年因改建的問題，停了派飯）。2013 年開始，祐漢街市也有派龍船頭飯了。2019 年，台山街市也有派發。關於派飯方面的財政安排，是各個街市獨立分開處理的。而據張國柱先生所言，營地街市在上世紀文革期間也沒有停止過派飯，是商販為祈福、福報、平安而施贈，且一直是用十三種東西來煮成的。這個舞醉龍的習俗，從族群至社會，從個體行為至族群、經濟，從一個部分增加至信仰、集體精神，從農業倫理、農時倫理至人時倫理，甚至從個體經濟發展至整體經濟倫理，到 20 世紀 80 年代，舞醉龍在澳門已經變成一種民俗活動。

中山縣舞醉龍因文革而一度完全消失，澳門舞醉龍於 80 年代開始回訪中山，為中山醉龍留下薪傳之火。而中山醉龍在 1996 年開始進入搶救和整理工作。不過，透過重新組隊，培育新人、添置新龍、編排套路而培育出來的舞醉龍，卻被歸入“民間舞蹈藝術類”¹²⁷，與澳門作為民俗活動有所不同。

澳門的舞醉龍從 80 年代至 1999 年回歸前，一直沒有間斷，每年四月初八，以首尾兩節的龍來舞動，比起 70 年代及以前的三段式的龍身有所改變，把當中抽象的中間部分抽離，使頭尾的體位表演更加突出，在表演形式上更具觀賞性。當中，用酒的形式，原目的為逐疫祈福。正如張國柱先生解釋：60 年代醉龍的形態，來自民間對龍的形態的演繹，喝土酒、白酒，求醉態與形似，

¹²²《市民日報》（1946 年 5 月 9 日）。

¹²³《華僑報》1940 年 5 月 16 日第 5 版、1995 年 5 月 8 日第 1 版，均如此說。又 1947 年 5 月 28 日第 3 版〈浴佛節即景〉談鮮魚行同志晚飯後大舞木龍外，還記“富家太太，手挈幼童，到魚欄吃飯，據謂：‘細佬哥食過聽教聽話’云。”

¹²⁴《澳門掌故》，頁 59。以及《華僑報》（1940 年 5 月 16 日第 5 版）本埠新聞中，范樂天〈浴佛節〉一文，以芡苗餅稱為佛教的寓意食物，與歲時相關，並謂與添丁之意相合。又參看黎東敏：〈醉龍遊鏡海 翩跹舞百年〉，載於《澳門雜誌》（2010 年 8 月第 76 期），頁 36。

¹²⁵〈魚欄行浴佛節不舞醉龍〉，《華僑報》（1949 年 5 月 5 日第 4 版）、〈魚行醉龍醒獅大巡遊〉，《華僑報》（1997 年 5 月 15 日第 5 版），兩個日期的報導都說明營地街市受重建影響而沒有派飯活動。

¹²⁶據古洪先生所說，澳門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傳承醉龍文化〉，《澳門人·澳門事》第 1753 集（2018 年 5 月 29 日）。

¹²⁷劉居上：〈澳門中山民間藝術淵源〉，載於《澳門雜誌》（2007 年 10 月第 60 期），頁 76。



噴酒是旁人噴的，以求維持醉的意態。而今天的舞醉龍，為了衛生，為了拍攝的美感，由舞者自噴，舞者自狀醉態，故而與以往不同。¹²⁸ 這種改變也顯示了醉龍的舞動，踏上自覺表演的層次，進入更具程式化的階段，對觀眾的號召力也有所提升。

在回歸前，舞醉龍的經費，由澳門鮮魚行自行募捐款項和贊助，是屬民間組織自發的活動，以體現民眾團結的力量。這些贊助，是在當時社會物資貧乏的情況下獲得的，特別是還曾經有香港魚欄商的參與，更顯澳門舞醉龍在民間的影響力。¹²⁹ 而舞醉龍亦會出席節慶儀式，1974 年嘉樂庇大橋開幕以及橋開通後的四月初七就去了路環、氹仔的魚欄舞賀，但後來路氹街市式微，便沒有去演示舞賀了。又參與過千禧年的慶祝回歸慶典，甚至百萬行的慈善活動。

中山醉龍舞與澳門舞醉龍的形式比較表

地方	澳門	中山
龍型：構造	龍頭（長 3 尺），龍尾（長 2 尺） ¹³⁰	一整條木龍（長 4 尺至 5 尺）。
顏色	金色，或銀色為主。	紅色為主。
形態	較為圓潤、流線型，有描畫龍身的鱗片。龍首有尖的開叉的鹿角，下頷有白絲的鬚。	較修長而扁，龍背有立體的鱗，全身紅色，沒有繪花紋。龍首的角呈小圓枝狀，下頷沒有鬚。
舞動形態：人數	兩人一組，一人持龍頭，一人持龍尾，相互配合。	一人手持一條龍來舞動。



地方	澳門	中山
握法	1. 龍頭：以一手的大拇指扣住龍角，手腕從底部托起龍頭，龍頭及龍頭後部的身體以手臂來承載。另一手作輔助，因應舞動的方向、姿勢，適當時把龍頭換手。 有時候，龍頭向中間時，以雙手握龍角向前。舞動時，跟龍尾動作相呼應。 2. 龍尾：以一手握龍尾的中間部分，以尾部的前端向前，以畫圓的形式舞動。跟龍頭相呼應。 ¹³¹	龍是完整一條的，以雙手一前一後地托舉、擺動，上下翻動地舞。前面的手托着龍頭下巴後部，後面的手托着尾部。把龍從下往上往側托舉，多需要兩手一起舉動或揮動。
動作	具備舞龍的功夫動作套路，先致意（上香、點睛或向主辦台作向前叩首）後舞動，以醉意為先帶動舞步。噴酒次數較多。可以少至二人的首尾醉龍的舞動，也可以多至七、八條龍首尾舞動，但仍是二人一組相互關顧地舞動。	以舞蹈為主體，先致意後舞動，以舞蹈動作為主，醉為次。噴酒次數較少。舞動時，酒罈也是舞動的花式之一，是屬於多人的花式群舞。
音樂	以鼓及鑼作出節拍與舞動的音樂，即場配合舞者動作。	鑼鼓及現代的音樂，音樂以錄音為主。
輔助	燒酒（白酒或米酒），啤酒。	米酒。

¹²⁸ 《市民日報》（1946 年 5 月 9 日）。

¹²⁹ 其實，從澳門魚業聯合會成立開始，香港的魚行同業都有一直參與澳門同仁聚餐及大會活動。《華僑報》（1946 年 5 月 9 日第 3 版）。

¹³⁰ 澳門醉龍的尺寸，尤其頭部，其長度約 3 尺，長短往往會因龍角（鹿角）的長短及舞動者的年齡來擬定。

¹³¹ 根據 Lao, Tong I, “When the dragon was drunken :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 Drunken Dragon Festival in 1947-2010”,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Macau, 2015。作者於 2008 年 11 月 28 日訪問劉惠洪師傅，劉師傅表示舞醉龍時，在首尾呼應中舞動尾部較難，並認為尾部才是整條龍的重點，參看論文頁 90-104。另外，整個澳門舞醉龍的形態，從 20 世紀 60 年代前後，實際沒有改變，從 60 年代何直孟的“澳門人舞醉龍歌”可以印證：“上不騎龍下舞龍，澳門壯士何邛邛。白髯老者彌健勁，鱗甲飛動酡顏容。謹呼舞蹈鬧一市，銅鈺鼙鼓響丁冬。縱缺佛頭先導引，變化不愁橫直衝。人龍色彩相映醉，蹲蹲善舞如雲從。十步噴酒忙矯首，神技非關用賞釀。……屢舞僮僮寧畏墜。見首見尾亦稱神，起伏屈伸翔四至。安得奔騰上九天，噓成雲雨生民庇。……”轉引黃坤堯：〈香港碩果社詩人人群的澳門描述〉，載於：《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第八屆粵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集》，頁 85。

六 澳門舞醉龍的祭祀儀式

舞醉龍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與發展，才能演變成一種民俗活動與節慶，從而形成今天的面貌。在談到今天的狀況之前，必須看看它的流傳情況，才能認識它今天面貌的所以然。（由於舞醉龍發展到今天已經變成民俗活動，故此下文開始，對舞醉龍的敘述，是以一種民俗活動來稱之。前面所述，它的發展概況，則大部分是整個民俗活動未成形之前。）

1. 三街會館與澳門醉龍之關係

三街會館是一整天節慶活動的起點，代表了澳門鮮魚行的不忘根本。而當中舞醉龍前的祭祀儀式，更是代表了歷代以來行業中人的精神累積，是一種存在的牢固的表現，更是文化薈萃的表現。四月初八日，在三街會館前的時間、空間、儀式，都代表着澳門鮮魚行的精神，不可忽視。

關於三街會館的建立時間，至目前為止尚未有確鑿的證據。而據現今文獻所載最早的碑記，則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重修三街會館碑記〉：

市鎮之有公館，由來尚矣。蓋所以會眾議，平交易，上體國憲，而下杜奸宄也。澳之有蓮峯山，前明嘉靖年間，夷人稅其地，以為晒（曬）貯貨物之所，自是建室廬，築市宅，四方商賈，輻輳咸集，遂成一都市焉。前于蓮峯之西，建一媽閣；于蓮峯之東，建一新廟。雖客商聚會，議事有所，然往往（往往）苦其遠，而不與會者有之。以故前眾度街市官地旁，建一公館，凡有議者，胥于此館是集，而市藉以安焉。奈經世遠歲增，牆（牆）壁傾圮，棟桷崩頹，凡客若商入而睹斯館者，莫不以風雨漂搖為憾。爰集澳中董事高義，群相踴躍，樂為捐貲。一時用鳩工人，少變其局而改創之。高



其垣墉，廣其坐次，越數月而工告竣。雖不必侈翬飛鳥革之華，而登斯館者，曠如洒如，將《詩》所謂“攸寧攸躋”者，有同美焉。夫古人紀事，勝地有書，喜事有書。岳陽樓，紀于范文正；喜雨亭，紀于蘇子瞻；黃岡竹樓，紀于王禹偁，其大較也，今當斯館落成，擇地既得其勝；而會眾議，平交易者，又得其便。將所謂上體國憲，而下杜奸宄于永久，其喜可知也。遂為之敘厥前後，紀以數言，並錄高義芳名，勒諸石以誌不朽，使後之覽者，知斯館之有所自而成。¹³²

從碑文內容可知，三街會館之所以立於營地大街、草堆街和關前街之中，乃因此處為商賈聚集的地方。

正如前節所言，在時間上，自明代嘉靖年間葡人寓居澳門開始，洋人已於澳門經商。但是在空間上，一直以來，華人的經濟活動卻沒有得到澳門地方政府完整的法律保障及管理。這使華商在與葡人進行商賈之時往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由是，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華人選擇了一方面位處澳門最繁榮處，一方面相近於議事亭，有與葡人聯繫之便的三街會館作為議事之處，以平息商業上的紛爭。¹³³

除了議論商業事務以外，碑文中的“會眾議，平交易，上體國憲，而下杜奸宄”亦顯示了會館具有維護國家主權、法律等的功能。¹³⁴而三街會館於清乾

¹³²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頁249-250。按：譚先生所載之碑文，均按原碑文格式分行，而本節均依原文轉錄，並以括號標示異體字。又按：據碑文所載，其推溯三街會館乃建於明嘉靖年間（1522-1566），但據葡萄牙人於1554年登陸時，澳門僅為一落後的小漁村，難有建設公館之可能，故不能以此為據。

¹³³ 陸美賢：〈澳門三街會館在清代的社會功能〉，澳門：澳門大學學士學位論文，中國語言文學系，2019年。

¹³⁴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頁248。



隆五十七年（1792）的重修，更是經香山縣政府的批示。¹³⁵ 這顯示了三街會館於清乾隆年間已在澳門具有相當的地位。而在三年前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營地街新建了墟亭，並分有豬肉、鮮魚、雞鴨和蔬菜四行擺賣。¹³⁶ 即三街會館此時所“平”之交易，包含了鮮魚販之事於其中。

及後，三街會館曾於 19 世紀進行過三次重修或擴建。在明嘉靖年間，會館“風墜其簷，雨零其桷，鼠穴其墉”，殘破不堪，遂於清嘉慶九年（1804）進行重修。至清道光十五年（1836），三街會館在一眾商戶的募捐下進行重建，並買得附近一房產進行擴充，在會館旁另設一闔澳公所進行議事¹³⁷。而據當時的重修碑記，會館已有神誕慶典的舉行。¹³⁸

至 19 世紀中葉，因為清朝紛亂的政局，大批的華人湧進了澳門。而葡萄牙在宣告澳門成為殖民地以後，其港口貿易卻由於香港的開埠而面臨經濟的危機。於是澳葡政府遂推行自由經濟政策，實施專營制度（又稱承充制），即由政府公開競標某一項貿易、服務的專營權，並從中收取承充金增補政府收入，從而解決澳葡政府當時的困局。¹³⁹ 在當時，競得各項專營權的主要為華商，他們掌握了澳門的鴉片、賭博、走私貿易等大部分業務，從中獲得了大量的資



本，並由此提升了華人的勢力與地位。

在這樣的背景下，三街會館於清同治二年（1863）再度重建，並增添三處物業擴展闔澳公所，擴充了華商議事的場所。但至踏入 20 世紀前後，隨著華商勢力及地位的提升，華人的機構逐漸建立起來，如 1874 年鏡湖醫院的建立，以及 1912 年澳門的商會（中華總商會）的成立等，澳門的華商機構從漁農社會走向了近代社會的發展。¹⁴⁰ 於是三街會館原有的議事功能遂轉移至其他地方，逐漸剩下供奉關帝的祭祀性質，是故到後來又被稱作關帝廟。

與此同時，華人人口的增加同樣帶來了魚販的增加。於 1883 年，澳葡議事局就因魚販隨街擺賣的情況嚴重而興辦了公局街市，並於 1901 年經華商盧九、王帝以官價購得米糙街及營地街各處屋宇一同改建，設立營地街市，及後成為澳門 20 世紀最大的街市。於是營地街市逐漸聚集了從事鮮魚行業的人，而位於旁側的三街會館，遂自然成為醉龍慶典舉行開光點睛儀式的地方。

三街會館之開始祀奉關帝，從現存文物考察，可追溯至清道光六年（1826）。¹⁴¹ 關帝即關羽，為漢末名將，為人持忠秉公，極守信義，於歷代曾獲 16 位皇帝加封諸侯。在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被迫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三尊關聖帝君”。至清雍正三年（1725），朝廷命天下直省郡邑皆設立關帝廟，並敕封三代爵公。而到了清道光八年（1828），更獲“忠義神武靈祐仁勇威顯關聖大帝”的追封，並與孔子並列為聖。可見關帝在明清期間享有極高的地位。而據蓮峯廟在清乾隆四年（1739）的重修蓮峯廟關聖帝君殿的“題金芳名碑”云：“帝君其聲靈赫濯，振古如斯。國土賴以奠安，商民借以默

¹³⁵ 據同年的《香山縣丞賈奕曾為營地街起建公館事下理事官諭》有“查澳門營地一段，原係官地，預備辦公之所……”之言，又云：“今本分縣因見該會館日久壞爛，是以修葺，從傍并建廟房一間，以為通事臨澳稍駐辦公之便……”可見三街會館在當時不僅只屬於華商，還曾為官方所借用。參看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頁 396-397。

¹³⁶ 葉農：《澳門街市》（澳門：澳門基金會，2016 年），頁 27-28。

¹³⁷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有“鼎建闔澳公所碑記”已亡缺的記錄，並言其立於清道光十五年（1836），頁 265。

¹³⁸ 〈重建三街會館碑記〉有“一支 列聖彌月（各坊龍獅進香銀俸待茶 燈彩棚樂燭祭品食用）等費共銀五拾二兩四錢二分八厘”、“其銀留後安碑及賀 列聖聖誕司祝工銀……”等記錄，即證會館在當時已有神誕慶典的舉行。

¹³⁹ 魚販即為其中一個專營項目，華人及葡人在當時均有競投。而當時的魚欄承充商有鄭子亭、鮑文光、盧合、葉瑞卿、黃錦等人。參看《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頁 223-261。

¹⁴⁰ 學界普遍將澳門華商組織的發展按其性質分為神緣、業緣、慈善、聯誼、政商五個階段。而三街會館即業緣性的代表，即選擇地方建立屬於本行業的組織。

¹⁴¹ 立於 1826 年的楹聯為：“義膽忠肝一生志在春秋全欲匡扶兩漢，丹心赤面萬古光懸日月咸欽降伏群魔”，而陳煒恆於《澳門廟宇叢考》中則記作“兩漢室”，由“漢室”、“丹心赤面”、“伏魔”之詞可推斷此所言及的乃關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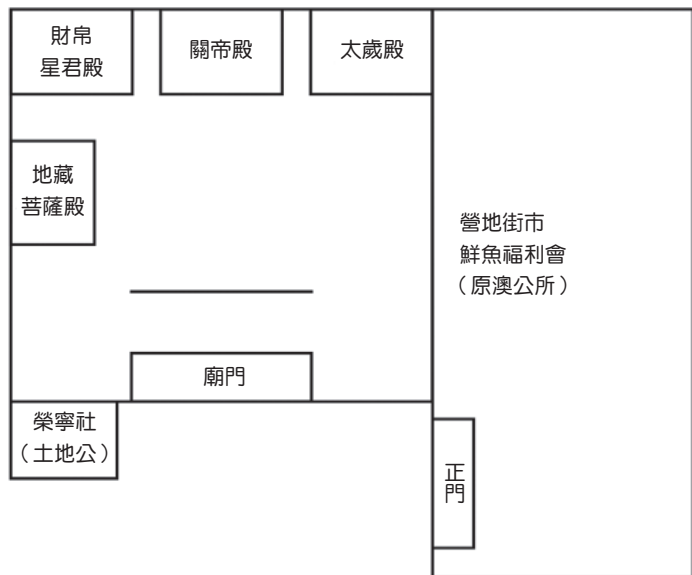


圖 2-4 三街會館的神祇 (2019)



庇……”¹⁴² 可知，澳門祀奉關帝有保佑國土安定與庇護商人經營之目的。此正與三街會館最初的功能相符，是故會館主祀關帝。除此之外，現今的三街會館還設有太歲殿、財帛星君殿及地藏菩薩殿，所奉財帛星君、伏虎玄壇趙公元帥、貴人祿馬、地藏菩薩及太歲皆與商業有關。可見三街會館的祭祀，實與商業有密切的關聯。而從三街會館所祭祀之神明大多歸屬道教的情況可知，舉辦於佛誕的醉龍活動並非為一個佛教的節慶，其開光點睛儀式亦由俗稱喃嘸師傅的火居道士主持，是一個包含道教祭祀儀式的民俗活動。

三街會館對於澳門醉龍的重要性，由以前華商的落腳地，像會館形式的照顧不同的族群，到後來為鮮魚行、各方社團所奉祀，以至今天在醉龍節上舉行的上香、祈福、派發龍船頭飯等各項活動或儀式，皆代表了族群的作用，有凝

聚力量的意義，以族群的上一輩的精神為念；也代表了一個重要的空間，能夠讓魚行中人摒棄個人觀念，為族群、社會做事。

2. 醉龍的祭祀儀式

儀式代表了一種實體的存在的的作用，能號召精神，對於所強調的信仰、習俗能作出現實的體會與共鳴，而不僅是道聽途說。

(1) 開光點睛儀式

醉龍活動最主要的祭祀儀式為舞醉龍。人們執龍起舞，以酬謝神明庇祐。而在澳門，傳統的木龍道具每節長約 3 尺，分頭、身、尾三節，後至 70 年代改為頭、尾兩節。製作木龍的材料為樟木或柚木。龍頭在精雕後彩繪出黑眼、紅嘴、白牙、綠鰭和金鱗，並配以鹿角。而龍身則以赤色為常見，另有紫、白、金、青四種。

形式上，澳門的舞醉龍起初乃由舞者即興演出，並無固定的表現。至上世紀 70 年代，澳門的武術界人士對其作出改良，遂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形式。¹⁴³ 舞龍頭、龍尾者需在半醉的狀態下，依據鑼鼓音樂，兩者互相配合作舞。而在以往，魚行人士均飲白酒作舞，至今已演變成飲啤酒。甚至在年輕人舞龍之時，更以水代酒，從傳統的依醉意舞動，變成依據步法套路起舞。所以舞醉龍的形式由表現酒醉的神態，逐漸趨向固定的舞蹈形式。

傳統上，舞醉龍者均須為男性，要在舞醉龍的前一天進行齋戒，禁通房事，忌食牛、狗、鯉魚以淨潔身心，並於農曆四月初八開光點睛後方可開始舞動木龍。但隨著當代的演變，一些街市於四月初七之時已開始舞醉龍，所以會提前祈福並為當天的慶祝宴會作表演。在以往的農曆四月初八，澳門的醉龍慶

¹⁴² 《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頁 130。

¹⁴³ 在上世紀，魚行人士由於需要於沿岸游上漁船取貨，需要一定的體力，故不少魚行人士均有習武。而鮮魚行於上世紀 50 年代已開設武術班（現稱為鮮魚行總會武術班），邀請澳門各武術名宿開班授武。



典一直以來都是以三街會館作為其舉行開光點睛儀式的地方。至 2009 年，當澳門的醉龍成為了澳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並正申報成為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魚行醉龍節，其儀式除舉行於三街會館外，還會在議事亭前地設舞台以作祭典。¹⁴⁴ 先於三關會館進行開光及灑淨儀式，而後再轉至議事亭再次進行道教開啟科儀、開光點睛及各項表演活動。由於現今在每年的魚行醉龍節上，其所舉行的活動及祭祀儀式之細節各有不同，茲以 2019 年 5 月 12 日的“魚行醉龍節”為例，略述其當天所包含的儀式。

早上七時三十分，魚行人士穿着印有魚行醉龍節的衣服，¹⁴⁵ 聚集於營地街市，於三街會館門前設壇準備。祭壇為一張長方形圓邊鐵桌，上置有祭品香爐一尊、燒全豬二隻、三牲（全雞一隻、魚二條、豬舌數塊）、營地街市之龍船頭飯配料。¹⁴⁶ 至八時，魚行內最有輩份者（劉惠洪）首先正對三街會館門前三拜上長香，並燃點紅燭一對，而喃嘸師傅會逐一為木龍貼上符籙，以作儀式準備。然後喃嘸師傅穿上紅袍，敲打鑼、鼓，並唸宣詞云：

魚行建酬於香山縣澳門三街會館。澳門工會舉行萬佛浴佛節，龍獅盛會。祝賀全體人員龍馬精神。又祝賀澳門繁榮興盛、國泰民安。全體市民生意興隆、工作順利、身體建康、步步高昇、龍馬精神。

此時，鮮魚行總會會長率先三拜上香，而其餘魚行人士則緊隨其後。接着，喃



圖 2-5 農曆四月初八三街會館的木龍開光儀式（2019）

¹⁴⁴ 澳門的醉龍慶典於 2009 年延伸至議事亭前地，參看〈魚行今醉龍醒獅巡遊 分於兩街市派發龍船頭飯〉，《澳門日報》（2009 年 5 月 2 日）。

¹⁴⁵ 醉龍、醒獅的舞者及樂隊的衣服為白色，派發龍魚頭飯及相關工作人員的衣服為粉色，而後者每年的顏色均有不同。

¹⁴⁶ 蔬菜一袋，包含節瓜、紅蘿蔔、芹菜；另有一鐵盤，置粉絲、冬菇、枝竹、雲耳、眉豆、白果、豬皮。



嘸師父持柚葉沾向十三條木龍及向五具醒獅潑灑聖水，以除淨污垢，並唸“天裡還天，地裡還地，神水降穢，萬穢消滅”云云，是為灑淨開光，為木龍注以神力。及後，巡遊隊伍敲響舞獅及醉龍的鑼鼓，舞醉龍隊先執木龍移步至議事亭前地，以準備進行道教太上開啟科儀及掛紅點睛。而五頭醒獅則原地起舞，同向三街會館廟門拜首，後隨醉龍隊離去。至此，三街會館的祭儀基本完成。待人流散去後，留下的魚行人士會進行化寶，而嘸師傅則繼續敲打鑼鼓唱唸，又再次頌讀宣詞並云“禮成”，最後繼續唱唸，為儀式作結。

澳門道教之太上開啟科儀是為神誕酬建祈福功德的儀式。當天，議事亭前地會置一大型的場地，一邊設有舞台置嘉賓席位，另處有道教三清的真像作為祭祀對象，前置神壇，放有水果祭品數盤、燭台兩座、鮮花、酒杯酒觥三副、香爐一尊及磬一個。在開始之前，道教人士會略敲鑼鼓，由高功（主持祭祀者）持焚燒的經符於木龍前唸咒，以注神力。其後，儀式先由司儀揭幕，邀請十二位穿着紅袍的道教經生進場，正對神壇分立兩側。隨後，高功將邀請鮮魚行總會會長、政府部門代表、總會榮譽會長及各街市負責人參拜上香，以啟請師聖。隨後，高功持笏板啟請師聖，以五雷令牌宣召各功曹官將，再執柚葉沾灑聖水以淨壇場，最後向三清發送表文，言明澳門道教弟子於此祈福。及後，鮮魚行總會會長及政府部門代表至神壇前敬奉祭品，再由高功向各神明告稟澳門鮮魚行於今祈福。最後分別由高功、魚行長輩（劉惠洪）奉寶參拜，並由人代轉至三街會館焚化。然後道教人士退場，科儀完成。

儀式結束後，眾嘉賓將為木龍、龍獅進行點睛及簪花掛紅的儀式。然後進行各項的表演活動，先有女子團員表現旗舞，繼而為醉龍表演、醒獅表演、武術演示（螳螂拳、長棍對打及長鬚劍）及魚旗舞動。最後，一眾嘉賓將與各表演者合照並結束在議事亭前地的祭典。

期間，一眾市民遊客、攝影愛好者及傳媒人士聚集於三街會館及議事亭前地欣賞表演並進行拍攝及錄影。其中，人們對魚行的舞醉龍，在其噴酒瞬間的畫面尤為喜好，皆爭相拍攝。而由於三街會館場地較為狹窄，逗留者多以攝影

愛好者為主；議事亭前地遂設有一處空地，予傳媒人士及攝影愛好者拍照，市民遊客則立於場地外圍觀，人群佈滿場地四周。

及後，魚行的隊伍會移步至營地街市進行“旺街市”。醉龍隊、醒獅隊及旗隊由一人執澳門鮮魚行的祭旗引領，依次進入街市繞行一圈。期間，樂隊將敲鑼打鼓，以期各攤販生意興旺。但是由於營地街市當天為表示對慶典的隆重，並無商販開業或設青待採，是故其“旺街市”僅以隊伍繞行一圈作結。然後，醉龍醒獅隊將分別乘貨車巡遊澳門各區街市進行祭拜及“旺街市”。在此中，醉龍醒獅隊伍將視乎各街市的攤檔是否設青迎獅，由醒獅進行相應的採青納吉。整體流程乃視乎各街市的情況，如在紅街市，總會隊伍僅會敲鑼打鼓駛經街市；但在祐漢街市，其街市門口將設青迎獅，而部分攤販亦有設青以待醒獅採納。

（2）魚行醉龍節各街市的情況

在魚行醉龍節當天，各區街市會擺設祭祀以奉木龍，並於鮮魚行總會醉龍隊到來之時，進行祭祀儀式。而每個街市的祭壇及祭祀流程略有不同，以下以紅街市、祐漢街市、營地街市為例，列表述之：

地點	祭壇物品	祭祀流程
紅街市	香爐一個，木龍首、木龍尾數具，金、銀龍首各一，燒全豬、全雞各一隻，小盤菜一碗，蘋果、橙、煎堆數個，蔥一紮。	燃放炮仗以示祭祀開始。先由主持紅街市魚行的總會理事長（關偉銘）奉大長香（上午10點半），魚行內前輩奉長香及香燭，然後一眾年輕舞龍者奉香。眾人戴上頭紅及手紅，執龍拜壇，而後起醉龍舞。最後燃放長炮仗，並開始派發龍船頭飯（上午11點）。
祐漢街市	香爐一個（獨立置於壇前），木龍首、木龍尾數具，燒全豬四隻，各類鮮花、佛祖像，水果、壽包一盤。 * 祭壇旁尚有音響播放佛經。	嘸師傅到場唸經。然後鮮魚行總會會長（蘇中興）及其他行內主要人士到場，待總會舞龍隊到達後開始祭拜（中午12點半）。眾人執龍拜壇，並開始醉龍舞。而舞獅隊及部分舞醉龍者則進入街市內進行“旺街市”及採青。事畢後，燃放長炮仗，並開始派發龍船頭飯（下午1點）。





圖 2-6 紅街市在農曆四月初八供奉木龍的祭祀（2019）



地點	祭壇物品	祭祀流程
營地街市	祭拜儀式於三街會館內進行，而三街會館中並無特別添置祭品。 * 早上開光用的祭壇已撤，營地街市此時並無設立祭壇。	梁安琪（營地街市魚行醉龍節最熱心支持者）到場（下午 2 點半），與鮮魚行總會會長（蘇中興）進廟向關帝上香，並以何宅名義（其丈夫為何鴻燊先生）添香油。然後燃放長炮仗，開始派發龍船頭飯（下午 3 點）。

從上表可見，除營地街市以外，各街市均有自設祭壇，並置有燒全豬及水果作祭品。而各個街市在流程上均先由鮮魚行總會領導或嘉賓上香，繼由舞龍者執龍拜壇、起舞。¹⁴⁷ 最後則燃放炮仗，以向街坊市民示意派龍船頭飯開始。

現今澳門魚行醉龍節的龍船頭飯派發，按食材主要分為素、葷兩種。營地街市主為葷食，其餘則為素食。其主要原因是營地街市乃最早派發龍船頭飯的地方，人們最初據街坊鄰里、社會人士捐來的食物製作龍船頭飯，以分享食物為主，故並無主素食之分。而其餘街市的派發乃後來興起，遂因應佛誕而派發素飯，以祐平安，從中可見醉龍文化受佛誕一定的影響。另外，祐漢街市為新的派發龍船頭飯之地點，始於 2013 年。其供奉佛祖的形式，或是為了在同為佛誕的當天，吸引一眾佛教徒的祭拜。

除此之外，各街市的龍船頭飯派發還體現了其獨立的表現。如由於紅街市魚行有較多的舞醉龍者，且近年又培訓了舞醉龍之青年。其祭祀流程，均完成於紅街市內的舞醉龍者，而總會龍隊並未到場，僅於經過紅街市附近時敲鑼打鼓。而祐漢街市則為新參與派發龍船頭飯的街市，市內魚販並無舞醉龍者，故需待總會到達時方能開始祭祀儀式。

從現今的魚行醉龍節看來，其祭祀儀式主要分為三街會館、議事亭前地的開光點睛儀式及各街市的祭祀儀式兩個部分。在前者中，三街會館為最初澳門醉龍活動的開光點睛場地。至 2009 年後，由於魚行醉龍節成為了澳門的非物

¹⁴⁷ 營地街市因在早上進行開光點睛儀式後已進行過“旺街市”，故下午的祭祀不復舞醉龍。



質文化遺產，¹⁴⁸ 且頗受遊客及攝影愛好者的青睞，¹⁴⁹ 遂將其祭典儀式遷至較廣闊且為人流中心的議事亭前地舉行。相較兩者，前者更能承繼醉龍的民俗傳統，故選擇繼續於此進行開光。而後者則因攝影愛好者及遊客市民對醉龍活動的關注，¹⁵⁰ 加上魚行醉龍節與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在同一年成功申請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故此往往多在醉龍節舉行時，聯同澳門道教協會進行太上開啟科儀，以示相互支持。¹⁵¹ 而比較兩處祭祀儀式的性質，前者偏向依據傳統，而主要舉行於魚行人士間；後者則增有嘉賓席，並由澳門道教協會主持，且設有專門的拍攝場地，又在祭祀後有各項表演，更趨近為一個向大眾市民遊客展現的活動。

另一方面，當代的魚行醉龍節祭祀儀式亦存在儀式感被削弱的情況。如在議事亭前地的祭典，加入各項表演元素，遂使其偏向於表演性質。在舉行儀式的時間方面，各項儀式並非嚴格按時舉行，乃是適時作臨場的調整。如祐漢街市在燃放炮仗以前，已開始派發龍船頭飯。另外，在舞醉龍方面，舞醉龍者均傾向執持木龍首舞動，有時也會打破以首、尾共舞的形式，獨舞龍首。這是由於舞龍首者更能吸引人們的目光，讓人對之進行拍攝。於是舞醉龍在傳統上首、尾呼應的舞蹈形式及其當中所存在的儀式感，開始被人們所忽略。可見屬於鮮魚行的醉龍民俗活動在當代的發展中，其儀式感有一定程度上的削弱。



七 澳門魚行醉龍節的產生及其意義

魚行醉龍節昔日又名“魚行醉龍醒獅大會”，最初是流傳在澳門魚行內部的活動，藉此團結魚行業內部人士。魚行醉龍節的產生，與澳門魚行業的發展有着密不可分之關係。前面的章節經已詳細記敘和描述澳門醉龍的起源及其歷史發展，本節主要談澳門醉龍如何由一種民間行業活動，逐步形成一個屬於澳門的節慶——魚行醉龍節，並以 2019 年澳門魚行醉龍節為個案，把當下澳門醉龍節的情況記錄下來。

1. 澳門魚行醉龍節的出現

上世紀 80 年代至 2008 年期間，舞醉龍的民眾進一步凝聚起來，由最初的三個職業群分別組成商會，最後結合成為澳門鮮魚行總會。由於人員的凝聚，醉龍活動亦因而得到強化。這除了體現在內部成員對活動自覺性的提高以外，亦因其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之一而漸獲重視。到了 90 年代，澳門正準備回歸祖國。在此歷史階段，葡人對中華文化亦漸有改觀，舞醉龍亦由此而受到更廣泛的歡迎。按 2000 年在《澳門日報》上刊登的〈澳門醉龍獨樹一幟〉有言：“以前的葡國節日活動曾經邀請過舞龍助慶”，又說“在巡遊之日，甚至有葡籍人士，要求客串”，更導致“有一位德國攝影師，拍醉龍上了癮，連續三年專程由德國來澳，每次巡遊跟足全程，為的是拍攝醉龍，其作品後來在歐洲一些刊物上登於封面，大受好評。”¹⁵² 澳門醉龍的信息開始向海外流播。

在 2000 年後《澳門日報》對四月初八的醉龍活動所作的報導，雖每年略有不同，但大體名為“醉龍醒獅大會”，而舉辦期間除了有鮮魚行總會人員的參與，更會邀請社會名士出席開光點睛的儀式。如在 2000 年的“醉龍醒獅大

¹⁴⁸ 魚行醉龍節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詳見於下節。

¹⁴⁹ 澳門的醉龍慶典於 2009 年延伸至議事亭前地，參看〈魚行今醉龍醒獅巡遊 分於兩街市派發龍船頭飯〉，《澳門日報》（2009 年 5 月 2 日）。

¹⁵⁰ 在 2007 年，即有遊客及攝影者提出，把醉龍慶典活動地點從三街會館改作議事亭的建議，參看：〈傳統節慶推動旅遊〉，《澳門日報》（2007 年 5 月 29 日）。

¹⁵¹ 道教科儀音樂於同期被列入澳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並同於 2011 年列入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據知情人士透露，道教的太上開啟科儀之加入，主要原因是其與魚行醉龍節皆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¹⁵² 胡國年：〈澳門醉龍獨樹一幟〉，《澳門日報》（2000 年 12 月 3 日）。